

锐观察

人物榜

欧洲主要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公共养老金是预防贫困最有效手段

经合组织国家老年女性平均贫困率普遍高于男性

■ 彭殊祚

近年来，欧洲养老金问题被频繁曝出，一些国家爆发了百万人罢工上街游行抗议等事件。

欧洲是全球最早建立养老金制度的地区，二战之后，各国普遍建立了以现收现付为主要融资方式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在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各国的养老金制度普遍遭遇财政危机。从90年代前后起，各国陆续启动改革，以控制支出，减少赤字。改革的方式大体相同，即综合运用参数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两种方式。

欧洲国家养老金改革大致分两个阶段

过去二三十年间，欧洲国家普遍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有两种方式，一是参数改革，即调整公共养老金的技术参数——退休年龄、缴费年限、缴费率等，实现增收减支目的；二是结构性改革，即增建基金积累制的市场化支柱，让企业和个人承担一定的养老责任。参数改革措施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减支措施，如将养老金待遇与工资脱钩，与物价挂钩，间接放缓支出涨幅；修改养老金计发的参照基数（如由参照职业生涯末期工资改为参照整个职业生涯的平均工资），做大分母，降低替代率。第二类是增收措施，如提高缴费率，通过促进女性就业、青年就业、引入青壮年移民劳动力、遏制提前退休等来扩大缴费人口，改善抚养比（即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口和缴费的经济活动人口之比）。第三类是既增收又减支的措施，如延长退休年龄。经过改革，西欧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已延至65岁以上。

参数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公共养老金的给付水平日渐不足时，各国陆续开启了结构性改革并基本形成了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但三支柱的发育程度以及各支柱在养老金体系中的占比存在很大差异。

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就开始对养老金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压低公共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另一方面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并通过“自动加入”机制将职业年金由自愿转为半强制，最终形成了由公共养老金、职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组成的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其中公共养老金是低水平的普惠制度，覆盖面广泛但保障水平有限。

德国的公共养老金在参数改革后保障水平骤降。2000年前后，德国通过李斯特改革

鼓励购买政府认可的商业性养老保险项目，同时鼓励雇主建立企业年金，单支柱的养老金制度逐步转向多支柱。

在法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也立法引入了基金制的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计划，但是基金制支柱发育缓慢。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类似。

改革带来五个方面的负面结果

改革有效提高了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下负面后果：

代际差异——改革将导致养老金待遇水平下降。

首先，随着退休年龄的延长和养老金计发标准的严苛，未来一代退休者整体上将工作更长时间、缴费更多、收益更少。经合组织的报告表明，在职业生涯完整的前提下，最近进入劳动力市场、于未来退休的人（1996年生人）和大约15年前退休的人（1940年生人）相比，平均退休金替代率将下降近6个百分点。

其次，改革导致未来的退休者将更多地依赖市场支柱，但市场支柱不具备再分配功能，能否从中得到充分保障，取决于两大因素，首先是能否“进场”。下列因素势必导致一部分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难以入场：一是大多数国家的职业年金是自愿性质，只覆盖部分人口；二是很多国家的职业年金有准入门槛（收入要求），这使低收入者或者被挡在外面，或者就算勉强拿到“入场券”，也只能得到与收入水平相当的低水平年金；三是低收入者往往缺乏购买养老产品或进行养老储蓄的财力，而不仅仅是某些“市场派”所宣称的投资未来的眼光；四是职业/企业年金都从待遇确定型转成了缴费确定型，这意味着收益的不稳定。另外，基金制支柱的增加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增长，尽管金融市场有自我修复能力，但老年人的抗风险打击能力较差。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老年雇员的打击最大，因为和年轻雇员相比，他们等待市场自我修复的时间有限，重建储蓄的时间少，再就业难。

综上，和当前的退休者相比，未来退休者的养老金收益将面临更多变数，贫困风险将提升。事实证明，在多支柱的混合制度中，公共养老金支柱占比低的国家退休者的贫困风险更高；占比高的国家贫困风险更低。

正规就业对比非正规就业——改革导致养老保障的“内部人”“外部人”分化。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增加等改革使公共养老金的

待遇水平与个人收入和缴费年限高度关联，只有能确保工作到退休的就业才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养老金。而连续性和稳定性差的就业势必导致退休金减少，这就造成了养老保障的“内部人”和“外部人”分化。正规就业者因职业生涯的连贯与稳定而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保障，成为养老保障的“内部人”。临时工、合同工等各类非全日制、非正规就业者则容易因缴费年限不足、缴费中断、缴费基数过低等因素而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甚至被抛出养老保障网（在缴费时长达不到最低缴费要求的情况下），成为养老保障的“外部人”。

此外，和正规就业者相比，非正规就业者普遍没有职业年金，且由于收入低而缺乏投资养老保险或储蓄的能力，因此不仅难以获得充足的公共养老金，而且在基金制的支柱中往往也处于不利境地。综上，非正规就业者未来将面临更高的老年贫困风险。

女性对比男性——改革带来养老保障的性别差异。改革导致了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性别差。女性因生育养育负担以及普遍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缘故，和男性相比，其职业生涯和建立在职业生涯基础上的缴费记录面临更多的中断风险，特别是更容易进入工作弹性较大的非正规就业部门，进而导致更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下降和老年贫困率上升风险。经合组织的统计表明非全日制雇员的平均收入比全日制雇员低一半左右。

低收入叠加缴费时间不足，女性和男性的退休待遇差就此拉大。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2021在全体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除智利外，老年女性的平均贫困率（16.2%）均高于男性（11.6%）。

法定退休对比提前退休——改革导致不同年龄退休者的养老待遇差。改革拉大了老年人的退休待遇差，增加了一部分退休者的贫困风险。原因在于，延迟退休等改革后，在劳动力市场的淘汰机制下，很多老年人特别是低学历低技能的老年人难以工作到退休，或者即使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往往也是辗转在各类低薪、低技能的非正规就业岗位上（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在65~74岁的在职老人中只有15%在正规就业岗位），很难从延迟中获益，只有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群体才能延长“高薪高质”的工作。结果导致公共养老金从相对贫困的人流向了相对富裕的人。

低薪对比高薪——改革拉大不同工资水平退休者的养老金差距。改革后公共养老金更紧密的缴费—待遇关联，以及不具有任何再分配性质的基金制支柱的上升，对低薪者

造成了严重负面冲击。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的养老金几乎已悉数改为缴费确定型，在相同的替代率下，低薪者的养老金水平更低；另一方面，低薪者往往是非正规就业者、自雇者等，难以被企业年金所覆盖，也缺乏足够的收入“进场”第三支柱，因此无论在现收现付还是基金制支柱的养老金制度下都处于更加弱勢的地位。

概言之，养老金改革后，女性、低学历低技能的老年人、60以上老年人、非正规就业者、低薪者、自雇者、被迫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者等群体，更容易成为改革引发的老年收入分配不公的牺牲品。这些群体通常是重叠的，一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往往同时是女性、低学历低技能低薪的非正规就业者。一部分人很可能终身陷在保障水平极不充分的小微就业中，再难回到正轨就业岗位。未来的养老金水平，个体差异将日益加大。

养老金改革是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

由以上分析可见，第一，养老金制度是个系统工程，改革要综合考虑充足性、完整性（覆盖率）和财政可持续性。

欧洲的改革实践表明，在提高养老金制度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再分配功能的削弱对非正规就业者、自雇者、女性、失业者、低学历低技能者、低薪者等弱势群体的冲击。

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了预防或补救措施，一是将病产假、失业、伤残等导致的缴费中断或非缴费时间适度折算成缴费。二是在改革的同时建立并加强由财政供款的“零支柱”养老救助制度，为改革后得不到充分保障甚至掉出养老金保障网的弱势群体构筑最后一道防线。三是建立有效的最低收入，以应对福利与缴费记录关联的不断收紧对不充分不稳定就业者造成的日益加剧的老年贫困风险。

第二，公共养老金占比高低和老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呈负相关，养老金越是从国家责任向市场转移，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性质就越低，减贫效果就越差。老年收入不平等现象就越严重。公共养老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预防老年贫困的最有效手段。

第三，养老金改革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环境变化而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各国需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养老金制度，使之既能为尽可能广泛的人口提供尽量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也不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财政能力。（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李庚润

美国非裔人类学家玛拉·弗雷德里克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担任哈佛大学神学院新一任院长，成为哈佛神学院207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院长。哈佛神学院成立于1816年，该院第一位非裔院长是1974年至1975年间担任代理院长的普雷斯顿·N·威廉姆斯。

“我很荣幸回到哈佛，并担任哈佛神学院的下一任院长。”弗雷德里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哈佛神学院拥有尽职尽责的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和朋友，他们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

现任校长克劳丁·盖伊是哈佛历史上首位非裔校长，她对玛拉·弗雷德里克重返哈佛表示欢迎。盖伊相信弗雷德里克的领导才能、学术地位、好奇心和协作精神，以及她深思熟虑和关怀他人的态度，将有助她成为一名优秀的院长。

学术生涯专注非裔研究

弗雷德里克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在斯派尔曼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于杜克大学获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弗雷德里克的研究方向为非裔美国人的宗教和历史，目前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担任宗教与文化系教授。他曾于2003年至2019年期间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担任非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在2003年加入哈佛大学之前，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并在辛辛那提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之后在亚特兰大跨教派神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的教学兴趣包括宗教人类学和非裔美国人的宗教经验，她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的宗教和媒体、宗教和社会行为主义，以及非裔机构组织在“后种族”世界中的可持续性。她出版了《彩色电视：美国宗教走向世界》《主日之间：黑人妇女与日常生活的信仰挣扎》两部著作，与人合著有《电视救赎：黑人宗教媒体与种族赋权》和《危城下的地方民主：行为主义、公共利益和私人政治》，并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其中，《危城下的地方民主》获2008年北美人类学协会书籍奖项。

弗雷德里克的工作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米尔顿基金会、路易斯维尔研究所和福特基金会等的支持。

跨学科研究非裔、宗教与性别

在弗雷德里克的学术研究中，她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宗教、种族、性别、媒体、政治和经济的交叉领域。《主日之间：黑人妇女与日常生活的信仰挣扎》是其跨学科研究的典型案例。

《主日之间》是一部创新之作，它带领读者超越对非裔宗教的常见误解和狭隘假设，重点探讨了宗教对非裔美国女性生活和社会行动的影响。弗雷德里克于1997年至1998年期间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利法克斯县进行田野调查，开展民族志研究，其研究侧重于非裔美国女性如何表达信仰，探讨了宗教性、灵性、主体性和社会行为主义在非裔美国女性中的复杂作用，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更广泛社会问题的关联。

资历深厚的领导者

弗雷德里克不仅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还是一位资历深厚的领导者。她曾担任2021年美国宗教研究学会主席，该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研究及相关领域的学会。她还担任过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的下属学会、非裔人类学者学会主席。她在埃默里大学曾供职于坎德勒神学院的终身教职和晋升委员会、人事和学术政策委员会以及战略规划委员会。

弗雷德里克在哈佛大学的十六年教学事业中担任过各类职务，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她曾担任宗教研究委员会的临时主席、研究生院主任以及非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系招生委员会主席。

弗雷德里克表示，“我十分期待加入哈佛神学院，为我们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社会培养宗教和公民领袖。现任院长戴维·汉普顿已辛勤耕耘多年，为学校绘制并落实了变革性的全球愿景，我期待继续实现这一愿景。”

正如哈佛大学教务长文伦·M·加伯所说，弗雷德里克深刻理解哈佛神学院的独特作用和影响力，她能充分认识到学院当前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机遇，“是未来几年领导哈佛神学院的合适人选”。

北京外国语大学以语述语

对外传播中国方言文化

■ 兰尊涵 贺曼萱

近期，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豪萨语、德语、俄语等专业的学生共同推出了多语种版本介绍中国方言文化的文章，在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同时，他们在校园内开展了线下方言文化宣传与传播的活动，吸引了校内外众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驻足学习和交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方言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进一步推广和传播中国方言文化，增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了解与交流，北京外国语大学“以语述语，千里传馨——多语种讲述中国方言文化”大学生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项目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方言专家及学者，他们将从方言的历史、语音、词汇、国际传播和多语种翻译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指导，准确呈现方言的独特之处并展示中国方言的多样性。

该项目将陆续呈现出多语种的方言文化宣传作品。这些作品将用丰富多样的语言和图像展示中国方言的独特魅力。

图特写

中国汉服亮相塞尔维亚诺维萨德

9月23日，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举行的“汉服节”活动上，一名学生展示汉服。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首届“汉服节”活动23日在塞尔维亚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举行，吸引不少当地民众驻足体验。

新华社发（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孔子学院供图）

老龄化加速，日本政府拟重点支持老年人就业

■ 刘林/编译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随着日本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扩大。日本政府正在制定方针，下大力气完善就业环境，以便让有工作意愿的老人都能充分就业，无论年龄多大。

“健康老人数量不断增长，我们欢迎有工作意愿的人士积极从事那些劳动效率更高的工作。”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武见敏三在17日参加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档电视节目时表达了上述想法。为了确保充足的劳动力，日本政府将重点支持老年人就业。

实际上，从日本总务省进行的劳

动力调查结果就能看出，老年人的就业率并不低。2022年的数据显示，65到69岁年龄段和70到74岁年龄段的就业率分别达到50.8%和33.5%。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乐见更多能够工作的老年人参与就业，不仅是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还是为了创建“全年龄段社会保障”，让老年人也成为支撑社保体系的一极。如果不能尽快扭转由在职人口供养老年人的社保结构，随着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扩大，代际间的不公平感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报道称，今年日本通常国会期间通过的健康保险法修订案就规定，分阶段提高75岁以上人口参加“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保险的费用。

在日本政府看来，老年人保持健康体魄、延长工作寿命将是维系社保制度的关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3日的记者会上指出：“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认知症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一个确保认知症患者有尊严、有希望地生活下去的社会已成当务之急。”

由岸田文雄担任一把手、相关阁僚参加的认知症对策会议将于本月内启动，会议将就如何对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帮助以兼顾工作和照护、推进延缓病情发展的相关研究等展开综合讨论。此外，日本政府还将在延长健康寿命、预防重症等方面加强应对。

（来源：参考消息网）